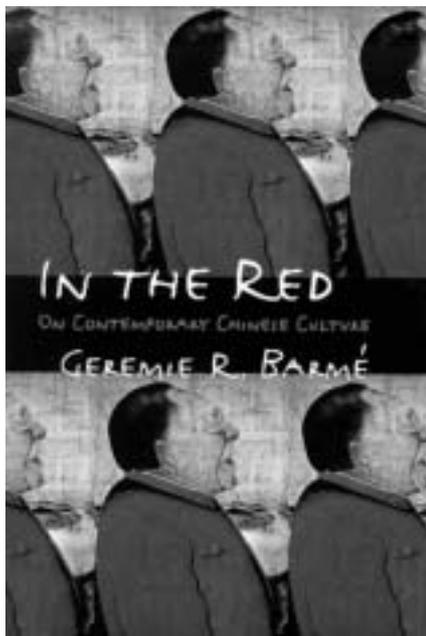


晚近社會主義、絲絨牢籠 和知識份子政治

• 徐 賁



Geremie R. Barmé,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晚近社會主義和絲絨牢籠

白傑明 (Geremie R. Barmé) 的《赤字：當代中國文化》(*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下稱《當代中國文化》)一書，把對90年代中國文化的觀察納入了一個他稱之為「比較社會主義」的視界。在這一視界內，他憑藉後斯大林時代東歐知識份子，尤其是匈牙利作家哈拉茲梯 (Miklos Haraszti) 對軟性極權統治及其與知識份子關係的分析，對中國當今眾多的文化和知識活動作了描述。白傑明尤其重視這些文化知識活動的大環境，將此稱呼為「晚近社會主義」和「絲絨牢籠」。

如何描述和稱呼90年代中國的基本社會政治狀態和文化環境，這本是90年代中國知識份子爭論的一個焦點，也是他們在許多具體文化

如何描述90年代中國的基本社會政治狀態和文化環境，這是當前爭論的焦點。對90年代大環境的看法越樂觀，對80年代後文革文化反思的批判對象（如專制和不民主、人道理想和啟蒙）在90年代的持續意義就越懷疑、越否定。

白傑明提出「晚近社會主義」的目的在於指出中國知識份子在文化思考中的兩個特定傾向：一是在熱衷「中西」、「中美」等跨文化比較的同時，卻偏偏忽略對東歐這一中國的「靈魂夥伴」的研究；二是在文化研究中小心翼翼地避免涉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文化問題。他對這兩種傾向提出了嚴厲的批評。

問題上(如民族主義、大眾文化、全球化、商業化、知識份子作用等等)分歧的關鍵原因之一。對90年代基本狀態和環境的樂觀描述和稱呼，以「後新時期」的說法最有代表性。後新時期被描繪為中國民族自我意識空前覺醒、多元文化「眾聲喧嘩」、大眾文化化解官方和精英文化的自由寬鬆時期。對90年代大環境的看法越樂觀，對80年代後文革文化反思的批判對象(如專制和不民主)和目標(如現代化、人道理想和啟蒙)在90年代的持續意義就越懷疑、越否定。相反，越看到90年代大環境與前幾十年的延續性，對此時期就越難持有樂觀的看法。強調中國政治環境近幾十年來的有機聯繫，拒絕在經驗層次上把新現象等同為新時代，這就要求對大環境的稱呼把特定時期的文化現象與社會制度聯繫起來。

白傑明的「晚近社會主義」命名在批判性上和傑姆遜(Fredric Jameson)的「晚近資本主義」有相通之處^①。和傑姆遜不同的是，白傑明的「晚近社會主義」不是後現代理論系統的一部分。他提出「晚近社會主義」的目的在於指出中國知識份子在文化思考中的兩個特定傾向：一是在熱衷「中西」、「中美」等跨文化比較的同時，卻偏偏忽略對東歐這一中國的「靈魂夥伴」的研究；二是在文化研究中小心翼翼地避免涉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文化問題^②。白傑明對這兩種傾向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他特別指出，現今的中國和1989年以前的東歐具有相似的生存環境，但中國知識份子在思考自己的文化處境時卻一直以批判文化傳

統來代替對「中國社會主義現實」的批判^③。

白傑明對中國知識現象的觀察雖然中肯，但他對這些現象的成因或效能分析卻未必能為大多數中國知識份子所接受。在對中國知識現象的成因或效能分析中，白傑明往往過份強調中國知識份子自覺接受官方話語的束縛或充當官方謀士的意向，而忽略了他們更深一層的「弱者反抗策略」^④。白傑明把中國知識份子批判活動中的文化主義傾向歸結為毛話語根深柢固的影響。他批評道^⑤：

在討論當代思想和政治問題時，文化派的托辭有其策略價值。這些從毛澤東思想大學校畢業的知識份子對古為今用或借古諷今的招數簡直太熟悉了。……這種做法的總體效果是混淆了中國文化情況分析的基本問題，而且事實上，它將知識份子的注意力從這一分析轉向較為討巧而且低風險的文化問題。

對中國知識份子處於政治壓力下所採取的聲東擊西做法，白傑明並不予以同情。他引用哈拉茲梯的話指出，當一個社會的公共言論必須以言外之意來進行時，這個社會的公眾生活實際上已經處於隱蔽的狀態。言外之意是一種人們力求自保、在言論中不斷實行自我審查的結果。訴求言外之意以求生存的言論不僅無法久存，而且還可能是官方新話語的先聲：「以言外之意進行的辯論可以是探測氣球的發送地，共識的實驗室，可控新利益的表達處，氣象資料的收集站，在那裏表

述的意見並不違背國家意志，只是時機過早罷了。」^⑥白傑明因此對中國知識份子充滿了失望：「眾所周知，比起東歐知識份子來，中國知識份子對極權／權威的日常統治更順從。」^⑦然而，白傑明對中國知識份子的總體評價大有以偏概全之嫌。90年代的中國確實有一些小心翼翼揣測政治風向、乘官方話語順風船的知識話語（如某些「後學」、第三世界理論、亞洲價值、民族特殊性理論等等），但是，具有獨立思想和批判意向的知識活動並沒有停止或消失。即使以白傑明理想化的獨立思想和批判意向標準來看，他也不能不承認還有像《公共論叢》派自由知識份子那樣的例外。

白傑明對當今中國知識份子批判作用的基本估計是相當悲觀的。除了他所說的中國知識份子的順從傳統，他也把「晚近社會主義」狀態中形成的「絲絨牢籠」式統治看成是造成中國知識份子喪失批判力的根本客觀原因。然而，觀察中國90年代知識政治的分野，其困難並不在於指出與官方話語合謀或對抗這兩個極端的差別，而在於恰當評估處於中間灰色地帶的種種話語（如人文精神討論、新國學、大眾文化理論、現代／後現代理論等等）的批判價值。白傑明對這些知識活動有興趣，但並沒有信心。他用《當代中國文化》的書題「赤字」所批評的，即是他所謂的90年代中國知識話語過剩、字詞超產，卻鮮有社會公眾效應的情況^⑧。

白傑明對「晚近社會主義」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它的特殊統治形式，即一黨專制由斯大林式的強制統治

轉化為後斯大林式的軟性審查監控，從鐵牢轉化為「絲絨牢籠」，「由粗野的、軍事化的斯大林式（也可視為毛式）統治轉化為一種軟性的平民政府」^⑨。白傑明指出，「技術官僚重新規劃社會契約，在新的社會契約中，共識代替了強制，合作瓦解了批判。（思想）審查不再是由笨拙的政治機構來進行，而是成為藝術家、讀者觀眾和政治人員共同參與的合作結果。這是一種『進步了的審查』」。白傑明提醒我們，對這種新體制，東歐作家有不同的稱呼。哈維爾（Vaclav Havel）稱其為「隱蔽暴力」，哈拉茲梯稱其為「絲絨牢籠」，在這個牢籠中，連壓迫和自我壓迫也會變成一種高級藝術^⑩。

在白傑明那裏，「晚近社會主義」是和「絲絨牢籠」這個概念聯繫在一起的。這兩個概念在極權統治問題上的組合點，使得白傑明所說的社會主義有別於其他類似的稱呼。鮑姆（Richard Baum）和謝夫琴科（Alexei Shevchenko）曾指出，海外中國研究因中國改革後的形勢變化而面臨「範型溝裂」問題。因此，中國問題研究者們迫切需要對中國大環境的新稱呼^⑪。其中不少新稱呼仍以「社會主義」或其反面「資本主義」為名稱主詞。以「社會主義」為主詞的稱呼有「資本社會主義」、「不完全國家社會主義」、「地方市場社會主義」、「單位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社團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社團主義」等等^⑫。以「資本主義」為主詞的稱呼則有「名稱資本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等等^⑬。這些稱呼大多着重於經濟狀態。雖然白傑明對當今中國的大

「晚近社會主義」的特殊統治形式，是一黨專制由斯大林式的強制統治轉化為軟性審查監控，從鐵牢轉化為「絲絨牢籠」。思想審查不再是由政治機構進行，而是成為藝術家、讀者觀眾和政治人員的合作結果。哈維爾稱其為「隱蔽暴力」，哈拉茲梯稱其為「絲絨牢籠」。在這個牢籠中，連壓迫和自我壓迫也會變成一種高級藝術。

德利克曾用「後社會主義」來讚許「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德利克認為，從毛澤東時代起，中國共產黨就在實行非正統的社會主義，一種可稱為後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他的後社會主義概念是為了打破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二元對立。

環境也以「社會主義」為主詞稱呼，但他卻側重在其「絲絨牢籠」的極權統治形態。以「絲絨牢籠」來闡發「晚近社會主義」，這樣得出的中國總體景觀自然就比着重經濟的觀察來得遠不樂觀。

白傑明對「晚近社會主義」和「絲絨牢籠」這兩個概念的闡述主要依賴中國與1989年前東歐經驗的類比關係。這種類比論述最好與其他關於中國社會主義的直接論述相參照，以幫助了解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極權政治結合的具體情況。皮克維茲 (Paul G. Pickowicz) 曾用「後社會主義」來說明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名存實亡和在後極權統治中所起的招牌作用。在皮克維茲之前，德利克 (Arif Dirlik) 就使用過「後社會主義」這一術語，並以此來讚許「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德利克認為，從毛澤東時代起，中國共產黨就在實行非正統的社會主義，一種可稱為後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1982年中共十二全會後，更是確立了鄧小平式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正統地位，使中國正式進入後社會主義時期。德利克說，他的後社會主義概念故意保持模糊，以便「把握歷史情況的高度曖昧性」^⑩。德利克使用後社會主義概念，是為了在政治元理論層次上打破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二元對立。這樣的概念恰好可以用來描述中國既不像社會主義又不像資本主義的特殊狀況。

和德利克不同，皮克維茲使用後社會主義概念，不是為了強調黨內高層如何重新界定社會主義，而是為了強調普通老百姓對社會主義

的感受。正如貝利 (Chris Berry) 和法格哈 (Mary A. Farquhar) 所說的，在皮克維茲那裏，「社會主義已經死了，別的情況正在發生」^⑪。皮克維茲的後社會主義概念概括了普通中國人經歷的失望和幻滅，概括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分配體制的崩潰，也概括了社會主義道德感召的破滅和社會主義代言政黨合法性的危機。皮克維茲強調，後社會主義並非指老百姓思考並拋棄社會主義理論，而是指普通公民在政治事務中缺乏參與，對社會主義發展前途失去信心，對以社會主義為名義的政治、經濟、文化體制失去信任，但卻又對中國現狀提不出有效替代理想。後社會主義是在社會主義理想喪失後繼續由舊體制維持專制統治的狀態：「在後社會主義中，儘管人們普遍疏離社會主義，儘管非社會主義的政治力量已經出現，失去作用的體制仍然根深柢固，仍然能對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造成傷害。」^⑫

皮克維茲所說的「後社會主義」和白傑明所推崇的東歐知識份子對後斯大林政治文化狀態的觀察分析相當吻合。這一狀態的特殊之處在於，人們雖然已不再相信官方意識形態，但卻並不公開表露。哈維爾稱此為後極權統治效果。哈維爾把後極權統治界定為這麼一種統治：它的權力聲音已不再能令人心服口服，但卻仍具有威懾力，仍能強迫人不得不作出相信的樣子^⑬。阿納諾斯特 (Ann Anagnost) 把哈維爾的這一定義用到對中國現狀的分析中去，並且指出，1989年以後的中國官方意識形態控制之所以能起到使

人公開表示信服的作用，是因為「政治恐怖有了更巧妙的形式。而且，國家的再分配權力使得社會意志被商品拜物所折服，在某些方面，商品拜物的控制力比資本主義更徹底」¹⁸。

白傑明的「晚近社會主義」和「絲絨牢籠」可以說是對「後社會主義」和「後極權」在中國結合的另一種表述。「後社會主義」和「後極權」是一對互補概念。後極權指的是社會主義理想死亡後，仍繼續以它的名義來運作的威權統治。而後社會主義則是指，雖然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倫理道德價值觀已經名存實亡，但它作為一黨專制的意識形態價值依然存在。白傑明對中國90年代社會主義和極權制度結合的分析着重涉及了市場經濟及社會商品化的作用和民族主義這兩大因素。這二者都與白傑明關心的90年代中國大眾文化有密切關係。白傑明對中國知識份子及其精英文化的批評也是在市場經濟、民族主義和大眾文化的多元關係中闡述的。

市場經濟、大眾文化和民族主義

市場經濟和商品化改變了社會主義在中國的結構，在消除了其道義價值的同時卻保存了其威權政治形態。在毛澤東時代，正統的社會主義包含三個主要因素：禁欲主義、平均主義和國家主義。這三種因素在中國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的變化過程中得以保存的唯有國家主義。國家主義的基本邏輯是，中國

需要社會主義，因為社會主義可以使中國盡快富強起來。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國家可以合理合法地要求國民犧牲個人權利和局部利益。國家的意志並不體現為社會成員日常的集體願望，而體現為由先進政黨洞察的歷史發展方向。只有黨才能將國家意志貫徹於社會，黨和國家是不可分割的一體。以國家為核心的社會主義，其核心不是公眾社會，而是由單一政黨掌管的社會。國家主義是社會主義和一黨專制在中國必然結合的樞紐。

市場和商品經濟瓦解了毛式社會主義的禁欲主義和平均主義，但卻沒有對它的國家主義造成實質的傷害。許多人期待經濟的自由化會在中國引發政治自由化，白傑明在《當代中國文化》一書中所持的立場恰恰與此相反。在他看來，市場和商品經濟對「絲絨牢籠」的維持、更新和運行是利大於害，而對於對抗性的異見文化則是化解作用大於庇護作用。90年代的大眾文化因新的市場和商品經濟環境而得到蓬勃發展，但在政治專制和資本的合力控制下，大眾文化遠未能代替精英文化成為相對於官方文化的異見文化的生成場所。白傑明把中國今後批判性異見文化的希望仍寄託於知識份子文化而非大眾文化。

現有的中國大眾文化分析中存在着這樣一種傾向：把對大眾文化的態度區分為精英主義和反精英主義兩種，並將精英主義與自由主義等同起來。這種區分有意無意地掩飾了主流官方文化在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互動關係中的主控作用。而白傑明對當前中國大眾文化的分析

許多人期待經濟的自由化會在中國引發政治自由化，白傑明在《當代中國文化》一書中所持的立場恰恰與此相反。在他看來，市場和商品經濟對「絲絨牢籠」的維持、更新是利大於害，而對於對抗性的異見文化則是化解作用大於庇護作用。白傑明把中國今後批判性異見文化的希望仍寄託於知識份子文化而非大眾文化。

白傑明指出，正是由於80年代官方發動的一次又一次運動，才使得當時的知識份子形成了某種程度上頗為一致的異類文化。隨着政治運動的消失，90年代的中國知識份子反倒因失去共同對立面而陷入日益加劇的互相指責。90年代中國大眾文化中的異類文化因素其實是80年代無害異見文化的延伸。

所凸現的，正是大眾文化、精英異見文化以及官方主流文化這三者之間複雜的多邊關係。

白傑明指出，市場對出版和信息流通的作用，的確削弱了官方權力對言論的直接壓制。但這並不等於給異見文化提供了生存的空間或機遇。異見文化的活力其實來自它所反抗的直接壓制。正是由於80年代官方發動的一次又一次運動，才使得當時的知識份子形成了某種程度上頗為一致的異類文化。隨着政治運動的消失，90年代的中國知識份子反倒因失去共同對立面而陷入日益加劇的互相指責^①。

雖然直接壓制和異見文化之間有某種相輔相成的關係，但白傑明並不認為中國極權壓制下曾形成過真正的異見文化。他認為，在直接壓制下的中國異見文化一直具有隨機性和妥協性，實際上是一種「無害的另類文化」（異類文化）^②。白傑明對80年代文化批評無害性的評價可以視為他對中國知識份子不如東歐知識份子這一基本評價的註腳。他認為，90年代中國大眾文化中的異類文化因素其實是80年代無害異見文化的延伸。

90年代中國大眾文化的無害性主要是從四個方面來說的。第一個方面是大眾文化中的異類成分，主要表現為玩世主義。玩世主義的作用與其說是反抗，還不如說是妥協和逃避。第二個方面是大眾文化以符號的多元造成政治社會民主的假象。官方話語對於非政治性大眾文化的容忍，造成了一種寬鬆多元的文化景象，從而增強了它壓制異見

文化的合法性。第三個方面是大眾文化憑藉中國的市場經濟而興起，但市場不僅能化解精英文化中的前衛和異見因素，而且也能化解大眾文化本身所包含的異類成分。第四個方面是大眾文化的本土性很容易被官方話語反西方的民族主義所同化。

白傑明對中國大眾文化和民族主義關係的分析亦成為他對90年代中國民族主義評價的一部分。民族主義成為中國90年代社會主義和極權制度結合的另一個支點。白傑明指出：「在處理棘手的國際問題時，一種新的民族悲情對提供政治整合和營造共識框架起了關鍵的作用。」^③白傑明把「說不」類書的一時大行其道解釋為普通人接受這種悲情民族主義的指標。但他同時指出，在如何解讀這一指標時，不能不考慮到反面意見在當今中國所受到的限制，因此不宜過份誇大民族主義的全民性。白傑明指出：「沒有公共知識份子，沒有自由的新聞出版，那些傳達給大眾讀者的、比較極端的、被黨認可的思想，其實並沒有真正受到質疑。」^④白傑明對民意的謹慎評估與那些把「說不」類書的銷量直認為民意、並把90年代民族主義認作「原型公民社會」和「原型個人主義」的解讀，形成了鮮明的對比^⑤。

白傑明並不認為90年代的民族主義完全由官方所操控。他指出，民族主義超出了官方意識形態，與之並不完全吻合，但民族主義卻有利於官方意識形態。由於社會主義思想意識的衰落，官方意識形態越

來越需要依賴民族主義²⁹。不過，民族主義之所以有機地溶入官方意識形態，與它在90年代的新發展密切相關。在中國，民族主義包括三個方面：民族感情、現代性話語和秩序意識形態。這三個方面在90年代都有新的發展，90年代的民族主義因此而具有鮮明的特點。

中國民族主義的第一個方面是對中華大群體的情感依戀和文化歸屬感，並在此大群體受到外來威脅時表現出強烈愛國心。激發90年代中國民族情感的並不是外來威脅的沉重危機感，而是由國家經濟力量快速發展引起的自豪和具有相當安全感的國恥回憶。這種民族感情成為娛樂性大眾文化的絕佳材料。新興的大眾文化形式，如體育活動、主題公園、民俗慶典等，使得這一方面的民族主義前所未有地滲透到社會各階層的日常生活中去。民族情感越使得民眾關心與中國有關的國際問題(如最惠國待遇、世界貿易組織、台灣問題等等)，對這些問題的排外主義操作(如「說不」類書籍)就越成為大眾文化的新寵和新的商業熱賣點。白傑明指出，這類出版物的反西方和排外色彩「對形成(中國)都市中心輿論有着不可限量的作用」³⁰。

中國民族主義的第二個方面是對現代性趨勢的取向和態度。民族主義思潮在十八、十九世紀產生於西方，逐漸擴展到世界範圍，成為與現代化共生的趨勢。在中國，民族主義的產生和發展與近代幾乎所有的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現代化變革都有聯繫。90年代知識份

子對現代化和現代性的反思的特點在於把現代性確定為一種西方霸權話語，並以中國特殊論為基點，強調中國自己的發展話語。白傑明特別提到兩種有關的新理論趨勢：一是後現代、後殖民理論，二是關於中國特殊性的理論。第一種趨勢是通過「後現代主義的中國化來為在國家問題上的政治逃避、沉默和道德中立作藉口」³¹。第二種趨勢則更複雜一些。它既包括某些全球化理論對中國在國家社會主義放鬆控制後，又轉受國際市場和國家資本主義控制的憂慮，也包括一些為毛時代政策辯解張目的「新左派」理論³²。

中國民族主義的第三個方面是它營造社會政治秩序的意識形態作用，並在此基礎上要求人們對現有的民族國家制度以及統治政黨奉獻絕對的忠誠。民族主義使得中國官方宣傳能夠以中西、中美價值衝突代替階級鬥爭，形成新的敵我意識形態。新舊敵我意識形態都是用來凝聚內部團結和忠誠的。作為秩序意識形態的民族主義，其要義不僅在於歸屬，而更在於服從，尤其是對秩序執行權威的服從。正如韋伯(Max Weber)所指出的那樣，從根本上說，服從秩序執行權威，就是認可其獨掌「暴力的合法使用權」³³。白傑明在《當代中國文化》一書中關注的，正是這種威權民族主義。

威權民族主義並不是民族主義的唯一可能形式，更不是它的唯一合理形式。正因如此，民族主義與威權政治在中國的結合，才更需要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就使用暴力

90年代知識份子反思現代性的特點在於把現代性確定為西方霸權，並以中國特殊論為基點，強調中國自己的發展話語。白傑明特別提到兩種有關的新理論趨勢：一是後現代、後殖民理論，二是對中國受國際市場和國家資本主義控制的憂慮，以及一些為毛時代政策辯解張目的「新左派」理論。

激發90年代中國民族情感的並不是外來威脅的沉重危機感，而是由國家經濟力量快速發展引起的自豪和具有相當安全感的國恥回憶。民族情感越使得民眾關心與中國有關的國際問題，對這些問題的排外主義操作就越成為大眾文化的新寵和新的商業熱賣點。

的意向和能力而言，90年代中國威權民族主義是毛式社會主義國家主義在此時期的延續和變化形式。爭取民主在中國的發展，其中就包括要爭回公眾社會的一項基本權利，那就是由輿論自由評說甚麼國家暴力是道德的，甚麼國家暴力是不道德的。如果公眾社會不能自由行使這項基本權利，那麼公民的其他權利也就沒有保障。在這種情況下，無論國家管制表現得如何寬鬆，它都是一座實行極權統治的「絲絨牢籠」。

註釋

①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xiii, xiv.

②③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 Geremie R. Barmé,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4; 5; 5; 6; 6; x; 7; 7; 355; 285; 371; 370; 256; 370; 271; 356.

④ James C. Scott,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⑩⑫⑬ Richard Baum and Alexei Schevchenko, "The 'State of the State'", in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ed. Merle Goldman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333; 333; 333.

⑭ Arif Dirlik, "Post-Socialism? Reflections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Marxism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ed. Arif Dirlik and Maurice Meisner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9), 364.

⑮ Chris Berry and Mary Ann Farquhar, "Post-Socialist Strategies: An Analysis of Yellow Earth and Black Cannon Incident", in *Cinematic Landscapes*, ed. Linda C. Ehrlick and David Desser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4), 84.

⑯ Paul G. Pickowicz, "Huang Jianxin and the Notion of Postsocialism", in *New Chinese Cinemas: Forms, Identities, Politics*, ed. Nick Browne et a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83.

⑰ Vaclav Havel,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in *Vaclav Havel: Living in Truth*, ed. Jan Vladislav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86), 45.

⑱ Ann Anagnost, "Socialist Ethics and the Legal System", in *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Learning from 1989*, ed. Jeffrey N. Wasserstrom and Elizabeth J. Perry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2), 181.

⑳ Xudong Zhang, "Nationalism, Mass Culture, and Intellectual Strategies in Post-Tiananmen China", *Social Text* 16, no. 2 (Summer 1998): 111.

㉑ Max Weber, "Politics as a Vocation", in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trans. and ed. H. 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78.

徐 賁 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